

## · 笔谈：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学术启示 ·

编者按：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，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走过了非比寻常的历程，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本刊特邀请四位专家从各个角度进行回顾与总结，以飨读者。

# 传播 · 反思 · 新的前景

## ——新中国 70 年史学的三大跨越

瞿林东

(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)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。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，这是一个大地生辉、普天同庆的伟大年代。70 年来，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，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中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、团结一致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70 年来，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，在理论认识的深化、研究领域的开拓、成果的积累、队伍的壮大、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，都取得辉煌的成就，值得认真总结。这篇小文，试对 70 年来中国史学行程的总趋势讲一点粗浅的认识，就教于同行和读者。

### 一、新中国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

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并在三四十年得到初步发展。这主要表现在：

第一，在理论上和研究成果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。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，以及他署名李守常撰写的《史学要论》于 1924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。1930 年，郭沫若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，这一马克思主义理

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，在中国开辟了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。

第二，在民族危难关头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唤起民众、坚定民族自信心、坚决抗击侵略者的思想武器。毛泽东的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、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和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、吕振羽的《简明中国通史》、翦伯赞的《历史哲学教程》、胡绳的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》等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第三，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，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，成为20世纪前半期最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，正如1946年侯外庐《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》（见张岂之主编《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》第八卷，长春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页）所说“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，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。……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，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。”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广泛传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其标志是：

从思想上和理论上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高潮。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至第四卷陆续出版，马克思、恩格斯著作和列宁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、出版，以及新型报刊的评介，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等，人们如浴春风，感受到新思想带来的激动和力量。这里，我引用白寿彝先生1981年在《从六十年来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》（《白寿彝文集》第6卷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48页）所回忆的一段文字，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的心境和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，他写道：

稍回想一下，这30年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停滞不前，我们不要只看见“四人帮”时期的那种情景，还应该从解放初开始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。是不是这样根据历史情况来作判断，还可以理解得多一点啊？建国初期，我在学校里工作，是做教师的。许多教师，在解放前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。这个时候，在解放后不久，规模广泛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了。不少教师参加了学习，而且是很认真的。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话，很受同学的欢迎。教师本人，对自己能够运用毛泽东的话和马克思的话来检查世界观，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去对照一些问题，深感这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有了很大的进步。事实也正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从实质上看，这还只是逗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，真正的掌握马克思主义，还不行。拿这个情况和今天相比，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进步了，大家可以研究。

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，生动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特点，也反映出了白寿彝先

生本人的亲身经历，因为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，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。

从研究问题的深度上看，推动了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、辩难，提高了史学界的学术水平，提升了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。这些重大问题是：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、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、汉民族形成问题、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问题、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、中国封建社会“长期延续”问题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，以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、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，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是不可能提出来的。这是因为，史学工作者在学习了唯物史观后，于潜移默化中逐渐从朝代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，对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产生敏感和兴趣，这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的一大进步。同时，在讨论和辩难中，史学工作者意识到，要想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，材料固然重要，但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显然是不够的，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对学习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。重要的是，这些讨论、辩难所积累起来的成果，以及众多学术专著中对这些所得的种种不同的反映，成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或参考，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。我始终认为，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讨论和辩难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。因此，中国史学界不应当忽略、更不应当否定这些讨论与辩难。

从史学队伍的壮大来看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，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。一般说来，学术中的讨论、商榷、辩难，不仅能推进学术的发展，而且也是培养、锻炼新生力量的机会和路径。以关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讨论为例，当年的参与者漆侠、宁可、王思治、朱绍侯、胡如雷、林甘泉等，都是中青年学者，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的学养和造诣，同他们直接参与上述有关重大问题的讨论是有密切关系的。

当然，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发展，也走过一些弯路，即“左”的政治思潮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、形式主义态度，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。从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态度来看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、完整的科学体系，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学懂它和正确地运用它，任何简单的做法都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，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；而“左”的思潮极易导致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。因此，在有关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，以及在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各个领域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、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。如对马克思主义某一论点或断语的夸大和误读，对某一历史材料之作用与价值在认识上不同的解释等，确实是存在的。这种情况不仅无益于讨论各方的论点走向接近与共识，反而又容

易产生新的歧见。这就给史学未来的发展造成了障碍，而克服这些障碍，则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尤其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。

## 二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史学反思

“十年动乱”史学成为重灾区，从整体上看，已无史学可言。“四人帮”鼓吹的“儒法斗争史”，不过是打着“史学”的旗号而推行其反动政治的手法罢了。可以说，中国史学前进的步伐停滞了十年之久，而极少数的史学家不得不转入“地下”从事研究工作。

1978年10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获得新的解放，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。不论是为了继续已有的研究，还是锐意开拓新的研究，中国史学界面临着两个任务：一是批判“四人帮”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，以及炮制的“儒法斗争史”之类的骗局；二是清算“左”的思潮在史学领域造成的危害，以明确新的进取方向。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任务。

1986年，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史学上存在五次“反思”的观点，并被六七家报刊转载。此后，我就这一观点应邀作了公开讲演。2015年，我在《史学史研究》第1期上发表了《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》一文，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论述，抄录如下：“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，20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国的政治形势从‘阶级斗争’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；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。于是，在经历了十年‘文革’动乱之后，中国的理论界、学术界从‘万马齐喑’的状态一下活跃起来，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。一般来说，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：一是‘四人帮’对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，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‘文革’前十七年中的经验、教训。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，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，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。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，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，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自尊、真诚、信念和热情。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。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，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；第二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、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目标；第三，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題。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、尹达、刘大年、白寿彝、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，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种观点和不同方法

竞相发展的形势下，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，并创造出新的成就。”

所谓“第五次反思”，是从史学史上作贯通古今的考察，即把刘知幾、章学诚、梁启超、李大钊及其代表性著作，视为前四次“反思”，他们之间或有时代的不同，或有性质的差别。对于这次“反思”的代表性成果，我们可以以几位前辈史学家的论述为标志。首先，关于总结经验教训问题。白寿彝主编《史学概论》（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359页）着重指出：“‘四人帮’反党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，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，以影射史学罗织别人罪名”的反革命伎俩，肆意践踏史学的尊严，造成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。其次，关于正确地、全面地理解和坚持、运用唯物史观问题。尹达《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——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》（《尹达史学论著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384页）强调指出：“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，是统一的、有机的整体。”“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，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，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，变成自己的思想、方法。这样，才能避免左右摇摆，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，取得科学成果。”再次，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。侯外庐指出，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，那就是“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‘民族化’。所谓‘民族化’，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，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，做统一的研究，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。”（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》自序，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8页）刘大年《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》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“五老”的贡献时，进一步指出“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，不断发展前进。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。了解先驱者们的成就，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，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。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，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，那么，现在和今后，按照新的条件，坚持这种结合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。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。”（《刘大年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02页）上面所举的这些论述，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反思的标志，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特征：反思与进取。

经过深刻的反思，拨乱反正，中国史学更加明确了方向，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：视野开阔了，研究领域拓展了，中外史学交流日益加强了，新问题、新材料、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。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最初十几年中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史学成果出版最多的时期。尤其是21世纪初启动的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”计划的实施，对提升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发挥积极作用，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
这个时期，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出现了一股“史学危机”的思潮，但在史学发

展的洪流中，这一思潮自然也就慢慢“退潮”了。这个时期，有大量的外国历史著作，不同史学流派的观点被引进国门，对活跃中外史学交流、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：中国史学怎样显示出自身的特点，怎样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显示出自身的话语权，这是需要史学工作者深长思之并作出回答的。

### 三、新时代与中国史学的新前景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道路上进入了新时代。新时代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任务，这样几项任务是比较重要的：

第一，对丰富的史学遗产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，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，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，逐步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确有许多工作要做：一是认真地清理史学遗产，继承其中优秀部分，并按一定的类例作细致的梳理。二是对史学遗产中这一部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，发掘那些可以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合、融汇的部分，使古今有所关联。三是进一步总结、提升、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，突显其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，积极参与同外国史学平等对话。

第二，新时代中国史学以更加理性的观点对待外国史学，应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，即一不排斥，二不盲从。习近平《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（《人民日报》2016年5月19日）指出“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，而是要在比较、对照、批判、吸收、升华的基础上，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。解决好民族性问题，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；把中国实践总结好，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。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。”这就是说，我们讲民族性一定是同时代性相结合的，我们讲世界性一定是与民族性相联系的。这样，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关系，逐步可以做到“中中有外，外在中中”。这是中国史学前景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第三，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。中国自古有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（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）的观念，此后，民为国本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均有所表现。司马光《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（见《资治通鉴》书末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9607页）称：一部《资治通鉴》主要是写出了“关国家之盛衰，系生民之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”的历史大事。这是从历史撰述上表达“民本”的典型一例。马克思主义认为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（毛泽东《论联合政府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

第3卷,人民出版社,1991年,第1031页)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,应当明确地坚信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,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……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”;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”(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》,《人民日报》2017年10月28日)。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本观在当前的表述,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核心之一。

第四,进一步确立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史学观。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,这一传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。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“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,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,立足中国、放眼世界,立时代之潮头,通古今之变化,发思想之先声,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,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,充分发挥知古鉴今、资政育人作用,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、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。”(《人民日报》2019年1月4日)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历史观、方法论以及学科建设、社会作用、人才培养等,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,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新前景的憧憬,全国史学工作者将为此努力奋斗。

(责任编辑:苏辉)

## 70年巴蜀文化研究的方向与新进展

段渝

(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0068)

从20世纪40年代初“巴蜀文化”命题的提出以迄于今,学术界在巴蜀文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,由于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,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,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,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,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,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“蜀无礼乐,无文字”的旧说,而且提出了“三星堆文明”“巴蜀古代文明”